

我没见过外婆。母亲幼年失恃，所以一辈子都在忆念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单单只说白和高，这样的话就重复了几十年。

“白”或是客观描述，妈也常说自己是一白遮百丑。“高”恐未必，我很怀疑是她童年视角所致。她是在白日梦里，也许我们原都在梦里，我笑自己：日子昏昏，外婆走的时候，母亲才七八岁。

若干年后，在病床上，妈招手要我走近：“昨晚我梦见了你外婆，她真高……”梦一般的，喃喃。一时，我真说不出话来，是因她的样子依然如孩童。

上小学后的寒假，我常住在外公那里，问起死去的外婆，他从未答话。转头，弯腰驼背，动作突然迟缓……据说外公外婆是十五六岁上成的婚，算少年夫妻白头。

我真真正能回忆的，应该是同一幢楼里的外婆。孩子们若不张家金家带前缀地叫外婆，必是叫的同一个。她姓什么，仿佛无人知道，也无须知道。因为只要唤作外婆，便人人都知道。连她女儿女婿也随众，屋里屋外只叫外婆。

时下流行一句话：女人就是一种态度。可她的态度，啧啧，我说不明白。

外婆的女婿人称小无锡，她家应该是无锡人氏。而以小呼之，除了表明丈母娘的家中地位，无他。每天夜饭后，女儿女婿丈母娘，穿戴整齐漫步在绿荫道上，成为很多人记忆里奇特的一景。此景中，最奇的是女婿走在中间，一左一右，双臂挽着母女缓行（不少人看她们却只以为是姐妹）。

晚风拂拂，仿佛神仙中人：见熟人皆颌首微笑，坦然，从容。

她与我家相隔壁。门敞开，门口挂一布帘，上不及天，下不落地，挡眼而已。我等小孩，在帘下来回进出，未听见叱骂，还常有糖果招呼。

一屋子雕花家具，连痰盂架上都缠着盘枝莲，属苏作的精细。房间不大，不见一星灰尘，或许因为东西多，倒显得暗沉。

有个外婆，年纪比我大十多岁，脚步不出声地走进来……他问外婆安好。惭愧，那时我只对外婆的点心感兴趣。外孙女小名平平，高出我一头。小大人似的，围着围裙，戴袖套。我们承欢膝下时，见平平手里拿着抹布，从桌子



想来觉得神奇，在我出生的同一年上海诞生了一档广播节目。后来，我上小学，她获奖；我告别童年，她换主持人；再后来，我上高中，她第一次把我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递了出来。

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全家人午饭前多了“开广播”这项差事，专由我负责。父母负责摆好碗筷，三人于是就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市民与社会》……”的熟悉片头中边听节目边吃饭。我父亲这个老顽童往往按捺不住激情，放下碗筷便去打节目热线，若是有幸得以发言，他常三分得意地对我说，怎么样，你老爸还不错吧。嗨，别看他这稳重内

仔细抹到椅子、凳子……辄起身，让过去，也让过来。她却从不叫外孙女歇会儿，吃点啥，怪！

拉我的小妹入怀，她赞：“真像我们家的人！”就有人忽把眼珠一横，脖子一梗，摔门跑出去了。大家

两个外婆

徐芳

笑：“吃醋了……”座中只外婆不笑，后来她说平平的教育，我没听完，便被同学喊走，也罢。

外婆喜国画，黄花梨的桌子上，日常摆着许多小碟：朱砂、藤黄、青、蓝……画的是山水。并没见她留下画作，四壁也不见张挂，悄悄卖钱了吗？此说纯属我瞎猜，只因她的钱袋松。不像我家，每到月底，更紧。妈脸皮薄，借钱总派我去，我也总能完成任务；还钱，自然还是我。她眯细眼看看，数也不数，便扔一小屉中。却回身给我拿一块米糖或

上世纪70年代初，我穿上军装，走进梦寐以求的部队，当了一名卫生兵。

我们刚当战士时，是不允许戴手表的，每天清晨6:00左右我们就得到病房，扫走廊、拖地、倒痰盂、打扫厕所。给一些重病人倒尿壶、打洗脸水这些现在由医院清洁工和护工干的活，那时可都是由我们这群穿军装的小丫头来做的。因为不能戴手表，科室发给

我们卫生班一个闹钟，每天早晨5:30闹钟叫醒我们。有几次，当我们还在梦中，只听班长大叫一声，“糟了，时间过了！”同寝室的四个人就像听到紧急集合号一样，“腾”地一下起身穿衣，头也不梳，就往病房跑，看着天上星星还一闪一闪的，我们也全然不顾，到了病房开始了每天早晨的工作，直到把痰盂倒完。值夜班的护士问，“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来？”我们说，“已经晚了。”护士说才3:00多呀。这时我们才知道，班长看错了钟，闹铃并未响起，但是谁也不愿再回寝室去了，干脆多干些活。

从医校毕业，我当上了护士。那时的部队医院非常讲究又红又专，红在思想，专在技术。对护士而言，很重要的一项基本功就是打肌肉针不痛，抽血和静脉针能够一针见血。而这些基本功都是在护士之间相互“练兵”，你给我扎针，我给你抽血。如果给病人抽血、扎针2针以上，

敛的中年男人，内心是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的。

由于父母高龄得女，而我又正值上学的年纪，聊到教育，母亲就自然拿我当样本。她是位极其开明的母亲，不但对我一贯放松，还为那些负担过重的孩子们担心。因此，当节目涉及教育类话题时，她也偶尔忍不住拨通电话，安慰那些神经过度紧绷而将压力转嫁于孩子的老师和家长们。“快乐才是读书的目的。”她总是那么说。

高中的某个暑假，我在父亲的怂恿下第一次拨通节目电话，记得那天是讨论教辅读物的利弊。前一天恰在书店待了

柿饼，让我雀跃而归。

平平妈会水粉和素描。成立向阳院，大门上要有宣传画。写字，大家推举了另一家的爷爷，他颤颤爬上梯子，小的们在底下扶着，递颜料桶，帮着换笔等，忙乱成一团。

画向日葵，非平平妈不可。可她说：太高。顺手就拿起一张纸，绞了样子，叫人去描。尔后，抱着大猫仰头看景，她用手指代笔，在猫背上轻轻勾勒，说这线条如何才有绵柔意，那籽儿不可太明晰……急得平平妈连声喊：“不要听她！”

我听。有一阵我常把绣活拿到她家做，她从不做女红，却娓娓道来：这里密，那里疏，一路说配色和针法，也是最明白不过。我的技艺因此而长进，仿佛有点名堂。慢慢的，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妈的脸上明显多了笑。

莫测外婆高深的，该不止我一人。传说她撮其要，形其神的话，不意传成了某人的外号，被堵着门吵闹。她只问：“我用脏字了？没……”实乃三个字，点评竟成了点破！

第二天的交班会上自己还要做自我批评。

我所在的医院是军区总医院，到这里住院治病的，或是部队军官，或是身染重病的战士。那时，我们和病人的关系，是真正的战友关系。毛泽东同志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

回忆在部队医院的二三事

江江

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指示可以说没入灵魂，是我们对部队军号的准则。至今还记得当时一个姓李的战士，是个农村兵，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住院是因为训练时身上碰到哪里，哪里就有一个乌青块，卫生所认为是贫血，吃了些药仍不见好转，转到了师医院，师医院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后来转到我们医院。住院时，这个小战士经常帮着我们卫生员干活。我们每天三顿给病号发的饭都是放在一个大饭车里，饭车要从一个大大的斜坡推上去。那时病区里根本就没有电梯，哪怕是上五楼，推饭车推病人这样的力气活都是我们推上这个大斜坡，因此很多病号都主动帮着医护人员做事。这个小李平时不爱说话，到了吃饭时间，他就

在膳食间推着车子，等着我们。可是随着他的病情

一天，边看小说边看人。看到不少被大人牵着买教辅书而对其他书敬而远之的同龄人，不觉有感而发。具体说了什么已经记不得，只记得因为被认同而

有一种声音来自你我

唐颖祺

自满了一番，只记得那天朱应老师接到电话的第一句话是“唐先生吗？”，我说“唐先生是我爸”；父亲听完我的发言，拍拍我的头说“我家小囡还不错嘛”，我内心得意表面故作镇静地答，“你也不错嘛。”

佛说：人不可起心动念。从

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文学喷发期的人，大概不会忘记作家高晓声这个名字。他的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风靡一时，成为读者争相阅读的名篇。其实高晓声的文学成就远不止这几个短篇，他一生创作了300多万字的作品，出了30多本书。他与同代的许多作家一样，一生坎坷，充满悲剧性。1957年他因与方之、叶至城、陆文夫等筹办《探求者》杂志并发表小说《批判》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老家农村。直至“文革”结束，他一直生活在农村，当农民和代课教师，过着像陈奂生一样吃了上顿愁下愁的困窘生活。因此，他对底层农民生活的艰辛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他对农民兄弟形象的刻画和南方乡村生活的描述是从骨子里头发散出来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看上去土得掉渣的农民，操一口常州乡村土话。不像今天有些作家，因写出一两篇作品，年轻时就离开乡村成了城里人，他们再写乡村难免隔膜，看到的只是一点浮在表面的现象和情景，只能通过想象来弥补生活体验的贫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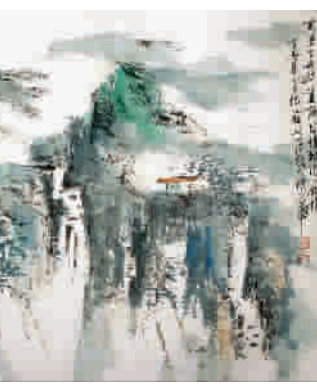
有人戏言，高晓声出国访问要带两个翻译，一个翻译将他的常州土语翻译成规范的汉语，另一个翻译再将他的汉语翻译成外文。

自上世纪80年代起，获得身心解放后的高晓声，创作一发而不可收，从1979年至1984年六年间每年有一部短篇小说集问世，其后又创作了长篇小说《青天在上》、《陈奂生上城出国记》等多部作品。正当他的创作进入黄金期时，偏偏天不假人以时年，1999年上帝向他发出了“邀请函”……

在今天，除了文学圈内人，大概没

轻轻地为他洗净身上每一处地方，给他换上最新的军装，为他整好军帽，敬礼向他告别，我们以这样的方式，送走过我们不少战友。因为我们早已把战友都当作自己的亲人。

十年的部队医院生涯，我深深感受到“救死扶伤”医护人员天职的分量；十年部队医院生涯，我在打不完的针，发不完的药，走不完的长廊中，体会了“白衣天使”的高尚。白衣大褂衬着永不褪色的绿军装和红领章、红帽徽，那是我青春、美好、最难忘的光彩。



高晓声与恐龙园

陈歆耕

有多少年轻人会知道高晓声，更不用说读他的作品。这且不论，遗憾的是今天很多人知道常州有个人造的恐龙园，但不清楚常州有个当代优秀著名作家高晓声。对于常州人来说，像恐

园这样的旅游景观和公共文化设施是重要的，它不仅可供大众休闲、娱乐，同时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常州人不该遗忘高晓声这样的当代优秀作家。高晓声之于常州，就如同陆文夫之于苏州、巴金之于上海一样重要，因为一个城市的文化、文学精英，代表着这座城市的精神高度，是这个城市的灵魂和心脏。恐龙园这样的文化设施和建筑，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再造，但高晓声、陆文夫、巴金，花再多的钱也无法再造，他们是唯一的

独特的，他人无法取代的。他们留下的文学遗产，将世代代润泽着我们这个民族（当然包括他们生活创作过的所在城市的后人）的心灵。

如果说文化设施和建筑，是一座城市的“硬件”，文化精英和人才，则是一座城市的“软件”，“硬件”缺少“软件”，该如何驱动？

突然想到高晓声，是因为常州的几位文友在一位企业家的资助下，新近成立了一个“高晓声研究会”。为成立这个研究会，他们经过10年筹备和努力，可

见做这件事是多么艰辛。我在电话中称，他们在做一件不忘前辈、惠及后人的功德无量的好事。在为研究会成立高兴之余，也为他们的努力之艰辛而稍感辛酸，更希望此后人们一提起常州，不仅仅知道有恐龙园，更有高晓声这样的优秀作家。

卢金德年轻时就结识了我父亲程十发先生，那时我家住在余庆路。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文艺萌动的春天，我将去国外留学，卢金德为我还算有点新意的中国画写了一篇推荐文章，署名芥子园，反响很好。因而我父亲见卢金德总称“芥子园”，人们误称为“驾驶员”，我父亲幽默地说，“卢金德是作家。”

卢金德看的书很多，严冬时节也捧着书。我父亲很是欣赏这种苦读书的精神，对卢金德印象也好。那时一位作家出主意道，“卢金德能写文章又懂画，把文学与美术评论结合起来应该不错。”这使卢金德很受启发，他那时在文联研究室供职，好多现在算得上大师的文学家、翻译家、戏剧家、音乐家他都是经常接触的，“与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与比自己有水平的人接触是卢金德学习的方法，也使他的文章有理论深度。

开放后，中国美术又从传承进入创新期，卢金德去了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犹如买得一张台前的票，他对上海美术的发展看得一清二楚。传统是非常理性的，而当代艺术要在形式上建立一种新调。卢金德认为，在当代，理论家、画家、观众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看艺术创作的，在创新中边开面貌边成熟，这是当代中国画的发展趋势。把沉重转为轻松是新国画的风格。卢金德就是以色彩的大写意表现山水画的皴法。这样大写意的色彩生动见骨，但在感觉上却是十分轻灵的。要取得这种沉厚转为轻灵的画面效果，卢金德为此也研究十多年。在美协的二十年，正是油画发展的二十年，上海的油画很见现代，中国画的写意本与现代油画没有区别，卢金德藏皴法，展现色韵之美，画面就往灵性中去了。

早几年中国的艺术从综合性走向边缘性，这是人们认识上的误解，那时有一首流行歌叫“跟着感觉走”。但是中国画本质上是文人画，很具想象力，如月色泻地，幽秀见骨。综合的学问仍然是中国画的本质。中国画的厚重感，也就是笔墨到了开放时代更加宽泛。一个画家要倾一生功，卢金德研习花鸟山水多年，很见功力。

明日刊
登一组《战地百合》。

十日谈

架起一座桥梁